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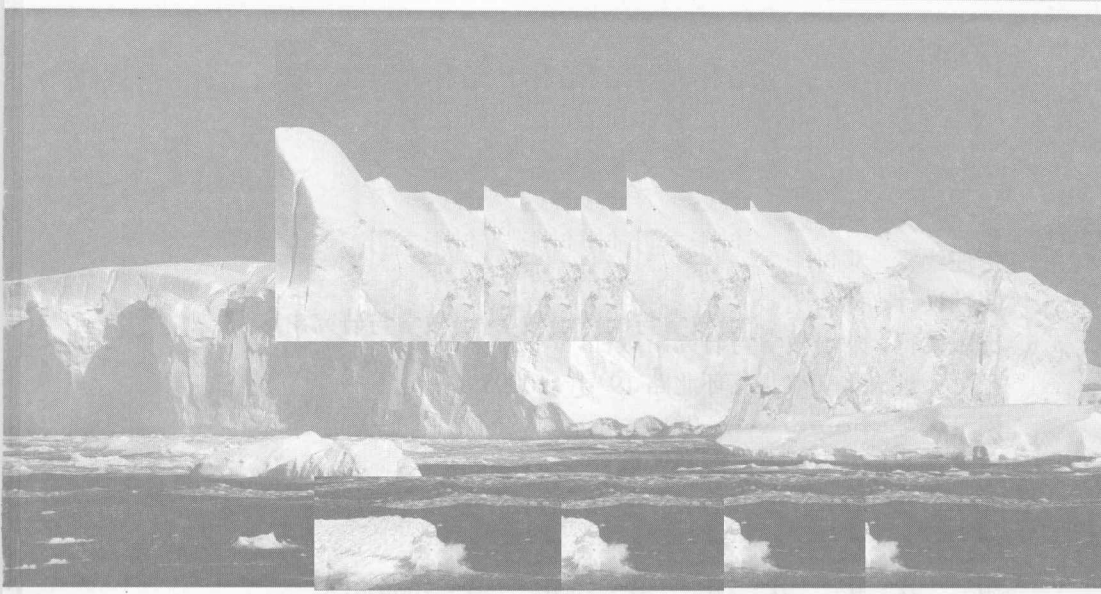


刘捷 邱美英 王逢振 编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刘捷 邱美英 王逢振 编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 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 刘捷, 邱美英, 王逢振编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600-8861-7

I. 二… II. ①刘… ②邱… ③王… III. 文学理论—西方国家—20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6607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邓付华

装帧设计: 孙莉明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8861-7

定 价: 32.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88610001

前言

如何阅读和应用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西方20世纪出现的各种理论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形成了“理论热”的局面。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和发展，人们对西方理论的认识也逐渐深化，从引进和全盘接受转向认真思考、批判借鉴、综合利用和反向输出（但这一点刚刚开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但是，大多数青年学生甚至研究生对西方文论和这一过程还缺乏了解。《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主要提供西方文论的基本知识，激发青年学生的理论兴趣，提高其综合理论素质，进而提高从事科研的能力。

许多青年学生认为理论著作晦涩难懂，甚至望而却步；也有不少人经常提出如何应用理论的问题。因此这里我想结合自己的体会，不揣浅漏，对学习西方文论谈谈自己的看法，与广大读者商讨和共勉。

确实，20世纪的西方文论对初学者来说比较困难，我自己也深有体会。1982年，我第一次到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进修，是年11月，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34—）应邀到该校作讲座，主题是他新出版的《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的要点，当时我基本没有听懂。由于当时在场的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出于他对中国的兴趣，他对我倒是非常热情，在讲座之后的酒会上，他主动与我攀谈。这是我们第一次相识。尔后他把新出的《政治无意识》送给我，并邀请我翌年春天去他当时所在的圣克鲁兹加州大学。为了准备到他那里去，我开始认真阅读他的著作，但读来读去，总觉得如在云里雾里，不是语言问题（因为即使有不认识的字还可以查字典），主要是不理解他的思想内容。于是，我带着满脑子问题去了他那里。我向他请教

问题，并告诉他我读不懂他的著作。他结合我提出的问题，为我指出了如何阅读的方法。在他看来，我之所以读不懂，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由于中国与外界隔绝太久，对西方现代社会文化缺少了解；第二，与第一点相关，我的文学知识太狭隘，缺少对哲学的关注，对现代哲学思想（如康德、黑格尔、萨特、海德格尔、拉康、福柯、德里达等）缺乏了解。如果我能弥补这些方面的缺陷，就不会觉得难懂了。但如何弥补这些缺陷呢？当时我连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如果要读完他们的著作，那要到何年何月呢？于是，詹姆逊告诉我，这些人的作品不可能短时间读完，但可以通过参考书先了解他们的基本思想观点，必要时再去查阅部分原著，以后有时间再多读原著。后来，我按照他说的方法想了解他们的基本观点，再读他的著作，果然有了明显的效果，并且开始对理论产生了兴趣。应该说，我后来从事批评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詹姆逊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的原因）。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如果你开始阅读理论著作觉得困难，很可能与我当时的情况相似，也就是说对西方社会文化了解不够（现在的情况比我当时好多了），理论基础知识还比较薄弱，但这时不应该放弃，而应该知难而进，采取詹姆逊教我的方法，认真阅读几本理论著作；由于在阅读过程中不得不查找参考资料，查阅原文，待到读完几本著作之后，就会理解所读的著作，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这样坚持下去，过一段时间，必然会取得进步，而以后再读理论著作，不仅不觉得困难，而且会不断激发新的思想，发现其中的无限乐趣。

理论源于实践，反过来又用于实践，与实践相结合并指导实践。尽管这是老生常谈，但却是真理。因此学习理论重在运用，而不是为了空谈。有些青年学生经常问如何运用理论或用什么理论的问题，恐怕主要是对理论的辩证关系还不甚清楚。其实，理论无处不在，但因为有些已经内在化了，你不再觉得它是理论。例如看一部电影，你会说这部电影很真实或不真实，你是凭直觉说的，但背后却隐含着“反映论”的理论。甚至当你说某件衣服漂亮和不漂亮的时候，你也在运用某种美学理论，甚至包含着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因此，理论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西方理论之所以令人觉得困惑，乃是因为我们对它还不够了解，自然谈不上内在化了。但随着我们认识的深入，等到融化为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它也会变得像你说真实不真实或漂亮不漂亮一样自然。

当然这需要—个相当长的过程。—开始，对于陌生的东西，人们难免会觉得无从入手。我自己觉得，学习理论和应用理论有些像练习书法：—开始学写毛笔字，大多从套红或写方开始，然后进行临帖，经过练习，在多种字帖或书法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自己的风格。因此，在学习和应用西方批评理论的过程中，我不赞成对一些初学者的模仿进行指责，譬如说他们“生搬硬套”或“食洋不化”，因为这是初学阶段难免的事情。当然，如果—味模仿，不求发展，就应该受到指责；毕竟，模仿是为了学习，是为了生成自己的东西，就像书法，如果—味临帖，写得再好，也不是自己的书法。如何生成自己的东西呢？我觉得詹姆逊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那就是要广集百家之言，汲取其精华，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到的理论见解，再以自己的理论见解去分析作品或文化现象。正如挪威霍尔堡国际纪念奖学术委员会对他的评语所说：“詹姆逊作品的特点是他对大量不同观点的开放性——包括那些远离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观点——以及他对其他观点兼收并蓄、综合利用的能力。”“詹姆逊虽然总是以文学研究为基础，但他对文化研究、阐释学、建筑和后殖民理论以及美学、影视理论和历史提出了意义深远的见解。”诚然，要达到詹姆逊那样的成就决非易事，但我们至少可以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

为了达到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见解，在阅读批评理论的过程中，还应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和联想，把读过的东西进行比较，找出异同，并尽量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于有启发的地方，或自己觉得特别重要的地方，要把自己的想法以笔记的方式记录下来。读书过程中会经常突然产生某种感觉和想法，或者平常所说的灵感，如果不记录下来，事后很可能忘记，或—时很难再找到那种感觉和想法，不得不反复重读。当然，有时有些判断、感觉和想法并不—定正确，事后可能会修正，也可能根据自己的“不正确”的判断继续下去，这也没有关系，只要觉得自己的想法合乎逻辑和道理，可以形成特殊的见解，那就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郢书燕说”的成语说的就是根据错误的理解产生出积极的后果。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关于误读的理论，也包含着对积极的误读的肯定。应该说，—切阅读理解都带有自己的主观性，融合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语境，不可能与原作者意欲表达的东西完全—致。在《旅行的理论》（*Traveling Theory*）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阐

述了理论在不同的语境中或经过翻译会发生变化的观点，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

上述几点纯粹是我自己的体会，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我觉得至少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可以为初学理论的读者提供一点借鉴。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内容基本涵盖了20世纪的主要理论思潮和流派，适合文科高年级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使用。书稿在成书之前曾在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试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因此被列入西南科技大学“十一五”规划教材。

当然，这本书不可能对20世纪所有的批评理论进行深入阐述，但它提供了基本的脉络，有志者可以以此为基础，阅读每篇后面提供的阅读书目，进一步深入探索。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出版得到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领导尤其是祝文杰编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陈才、陈贻雄两位老师做了大量的辅助工作，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本书难免有不当和疏漏之虞，我们恳请广大师生和读者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

王逢振

2008年10月于西南科技大学

导言

20世纪文论的背景

—

20世纪是个辉煌的时代，同时也是个苦难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拓展了人们对物质世界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从微观方面，人们已经看到了电子排列的方式，揭开了遗传基因的秘密；从宏观方面，已经进身太空之旅，为不断扩大的、在“大碰撞”和空间弯曲中产生的宇宙现象，增添了类星体、脉冲星、夸克、放射星系和黑洞。这期间，旧观念的修正，新意识的建立，从探测宇宙奥秘到物质生产分配，种种壮丽的想象都增加了实现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20世纪经历了两次极其残酷的世界大战，战后痛苦的余波和不间断的地区战争、重建国家的艰辛和冷战的压抑，这些又是史无前例的苦难经历。人们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的种种现实，撞击着他们的心灵，产生出惊奇、兴奋、痛苦、彷徨等复杂的心情。尤其在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的情况下，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因素，既有模糊的憧憬，同时又令人感到一片混乱；既张着吞噬一切的大口，同时也展现着无限的未来。于是，人们感到正在出现某种新的、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东西。这种意识强烈而真挚，但又抽象而朦胧。因此便出现了新的各种不同探索和认识新事物的方式，或者说方法和理论。

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出现在18世纪，16世纪末以后发展起来的力学是这次革命的理论准备。这次革命使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发展成为机器生产。第二次技术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19世纪中期以后物理学的发展，如电磁学和热力学等，为它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次革命的结果使资本主义早期

的机器生产发展成为电气化的生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这次革命的标志是机器生产或电气化生产发展成为自动化的机器生产，而这种转变的关键是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和应用。三次革命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因而也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革。第一次革命产生了市场资本主义，第二次革命产生了垄断资本主义，第三次革命则产生了跨国资本主义。换句话说，第一次革命开始了现代化，第二次革命实现了现代化，第三次革命开始了后现代社会。因此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主要语境是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社会。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¹ 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正是与西方社会的历史条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大体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文论受到了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方法论的影响——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直接影响到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其次是社会的发展引起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因而引起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第三是社会条件的变化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从而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实践，引起认知方式和理论方法的发展。这三种情况纵横交错，彼此间也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因此，对待西方文论，应该注意它们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强调关系和过程研究，可以说是各种西方文论共有的特点。

二

这里，也许我们应该对“文论”这个术语加以界定，因为它已经大大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文学理论。其实“文论”一词是中国人在翻译中的一大发明。在西方学术界，并没有一个专门与之对应的词。我们所说的“文论”，在西方一般指“批评理论”、“理论”、“话语理论”以及现在在广义上所说的文化理论。简单说，就是关于文字（包括各种符号）和文本（包括社会文本）的理论。这种理论的产生和应用与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5页。

从总体上看，过去的文学理论以语言的“表征模式”为基础，即语言模仿、再现或反映现实。也就是说，文学通过语言对现实的模仿和再现，能够反映现实的真实和本质。换言之，在语言之外，有一种先于人的、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先验的存在，文学反映的正是这种存在的真实和本质。然而，这种先于语言的真实和本质并不存在，或者说，在语言的表征和模仿发生之前，它并不能自动地、直接地呈现在人的面前。因为，不经过语言，任何真实或本质都不能成立。说到底，所谓的客观真实只能是一种主观假设，因为人们的思维离不开语言，而人一生下来，就进入了“语言的牢笼”——一种先于他而存在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一种固定意义的关系网，决定着 he 存在的地位，决定着 he 与自然、社会、历史、他人和自我的关系，也决定着他的行为及其与其他人交往的方式。因此，人并不是自由地支配语言，而是被语言支配，语言并不是一种死的、随手拿来可用的工具。

根据这种语言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和与之相关的文论，普遍抛弃了语言的表征模式。语言不再是对外在现实的模仿，不再反映真实和本质，所谓的真实只是语言构成的一个幻影，所谓的意义只能产生于语言本身，意义是在语言运用过程中产生的，是语言符号排列组合的结果。于是，阅读和解释不再是“发现”真实和意义，而是“发明和创造”意义。这样，一切文本都不再有绝对的意义，失去了统一的核心，而解释变成了一种自由的个人活动。

其实，这种转变也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众所周知，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强调主观和强调客观的争论一直存在，而且将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因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争论，实质上是由不同视角和不同出发点引起的争论，永远不可能达成一致或此胜彼败。例如一个人手上有根刺，强调客观的人说，因为有刺，所以我觉得疼；而强调主观的则说，因为我感到疼，所以才发现有根刺。如果用于语言学转向的问题，可以说，因为有客观存在，所以语言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或模仿；但是，如果人们意识不到这种存在，这存在等于虚无，而如果意识到这种存在，就必须通过语言，所以存在是靠语言构成的。这听起来像是诡辩，但却充满了辩证。

然而，20世纪为什么会出这种语言学转向呢？这同样应该从社会发展来考察。随着时代从现代进入后现代，或者说计算机时代，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计算机化的电子结构、巨大的商业网、无形的大系统，引

起了可怕的新极权主义的前景：“居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将制造一个统一的、包括一切的、超星际的、为自动化而设计的组织结构。人不是作为自治的人而积极地发挥作用，而是将变成一种被动的、无目的的、由机器控制的动物，他们的正当作用……要么被机器吞没，要么因丧失个性的集体组织的利益而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控制。”¹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个人，他们不知道向何处去；他们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在意见方面混乱而踌躇，在行动方面分散而缺少连贯性；他们担心而又怀疑，但却不能集中他们担心和怀疑的目标。正是这样一种可怕的前景，使得以怀疑论哲学为基础的文论开始兴起，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在七八十年代达到了巅峰；同时，为了强调个人意识的作用，对抗大系统机构的垄断和控制，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理论，如接受美学或读者反应批评，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承认和发展。

20世纪文论发展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文化转向”。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知识商品化的出现，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发展和运营方式，已经使经济权力开始危及到国家的统治，至少关于投资的部分决定超出了国家控制的范围。正如有人说过的，比尔·盖茨在决定世界事务方面，有时超过了总统的权力。记得1996年中美贸易谈判时，双方各提出过一份商品制裁名单，中方的名单中包括福特牌汽车，但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声称，这种限制对他们并无妨碍，他们可以从加拿大或巴西的工厂向中国出口。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跨国公司的力量。

此外，随着后工业社会（或计算机时代）的发展，知识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知识的提供者和应用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知识也商业化了。于是，知识生产力不仅构成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同时也使它成为世界权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很可能有一天会为争夺知识和控制信息而争斗，就像过去为控制领土、掠夺原材料或廉价劳动力而进行的战争一样。这样，知识一方面为商业开辟了新的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政治战略带来了新的挑战。于是在西方出现了知识政治化的趋势，政府和各种机构竞相加强对文化的控制，结果在知识界激起了一股反垄断、反权威、反控制的浪潮，并由此激发出文化研究，出现了从国家、民族、种

1 Lewis Mumford. *The Myth of Machine* (1967), cited in *Harvard Guide 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ing*. Ed. Danniel Hoffman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7.

族、性别、阶级等方面进行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

简而言之，这种理论关心的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人类经验的生成和再现、以及人类主体的构成。今天，文化研究同它的发展现状一样，是一个各种学科混合的领域，同理论本身一样难以界定。可以说文化研究和理论并行不悖：理论是文化的理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或者说文化研究是文化的实践，理论是关于文化实践的理论。当前我们所说的“文论”，似乎也应该从这种意义上来考虑，而不仅仅局限于关于文字语言或文本的理论。

三

就文学研究而言，理论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它过去一直存在，只是不那么集中、不那么系统罢了。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文学的理论话语引起了一次根本的变革。如果说现在理论看上去是新东西，并不是因为对文学的理论阐述行为是新东西，而是因为当代批评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当代理论最重要的特点有二：一是它的异质性，即各种理论并不求取一致；二是对传统批评的基础和设想进行空前的批判。美国著名批评家乔纳森·卡勒将其归纳为四点：一、它们是跨学科的——话语的效果在其原学科之外；二、他们是分析和思辩的——力图找出我们称之为性别、语言、意义、著作、主体等诸多事物的内涵；三、他们对常识采取批判的态度——批判那些被自然而然地接受的观念；四、它们是内省性的——对思想进行考察，探索人们使事物产生意义的范畴，既包括文学实践也包括其他话语实践。¹

文学研究一向是个多元化的学科。构成传统的各种实践，例如文学史、文学传记、道德—美学批评、新批评等，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一直在一种相当稳定的不平衡状态下共生共存，它们对作者、文学作品的性质、以及批评的目的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认识。批评家对某一作品是否纳入经典可以进行争论，但对所谓的“文学”本身的存在并不怀疑，对作者决定作品意义的看法也不怀疑，对批评依附于所研究的文学对象也不怀疑。

1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5.

而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当代理论话语的严厉的质疑和重新评价。

当代的批评理论认为自己不仅已经成为独立的学科，而且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日常工作。它拒绝接受依附于文学的边缘地位，也不承认是更接近哲学的一种外部关怀。它把自己置于批评事业的核心，坚持认为一切批评行为都不能超越理论。正如许多理论家所指出的，研究文学所用的传统形式的批评，对文学名著的反应不可能没有理论，也不会是纯学术的努力。所有形式的批评都依据某种理论，或某种混合的理论，不论它们是否意识到这点。理论著作已经表明，在文学研究中，那些常常被视为“自然的”、“常识性的”方式，实际上靠的是一套理论指令。对批评家而言，这些指令已经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无须在自己的实践中再作证实。

理论转化为文学研究日常工作之后，引起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有些批评家认为，理论深刻地隐含于文学研究的日常工作之中，隐含于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之中；另一些批评家认为，理论不应该直接指向研究的对象，而应该在抽象深奥的领域运作，脱离细读和对作品的直接研究这些标志传统特点的方式。大部分理论是抽象的，不直接为探讨文学文本提供一种方法，但对文学研究的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会因理论缺少直接的实用价值而被取消。文学批评学科基本上以与研究客体的直接联系为基础，但这是历史决定的，而不是必然的或自然的。对正统批评的部分抨击，涉及到研究文学的自然方式的确定。如果文学理论有时嘲讽它所抨击的传统，使它看上去像是单一的而不是多元的，那是因为它的抨击目标不是构成传统的那些批评实践的多样性，而是它的基础，它的一整套基本设想——传统的批评顽固地坚持这种基础或设想只能是“自然的”和“可以感觉的”。

传统批评的基础是一种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确定性，认为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每一种批评形式都侧重于一个不同的方面。例如传记批评强调作者，历史或社会学的批评强调背景，新批评强调文本自身，道德—审美批评强调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然而，它们都接受广义的文学模仿论，就是说，对于生活和人类的生存状况，文学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反映并提供所谓的“真实”。文学的任务是描写生活，以潜在的方式描写经验和情感。批评的工作是揭示这种描写的真实价值和意义。这里有一个

悖论：这种描写包含在文学之中，但却需要批评活动把它揭示出来。

模仿论把语言看作一种透明的媒体，现实可以通过语言以美学的形式再现，并超越文字的表述。这种语言观又与一种普遍的世界观相联系：人是世界的中心，认识是经验的产物。经验先于表达它的语言，语言只是表达它的工具。按照这种看法，文学是杰出个人的集体产物，他们能以语言表达人类普遍的、永恒的真理。换句话说，文学是少数精英的行为。

当代理论质疑和批判的正是这套基本的设想，并在批判实践中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理论观点。通过这些批判，围绕文学研究的传统共识以及支持它的意识形态现在已经分崩离析。例如，女性主义把文化政治引入到文学研究，读者反应理论把研究的中心从作者和文本的关系转向文本和读者的关系，新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介入并干预社会，后结构主义颠覆传统的形而上学认识，后殖民理论反对文化霸权，后现代主义推进多样性，等等。

如前所说，新理论的出现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它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和运用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整个人类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乃至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新的情况，人们如何认识社会，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便成了思想界和知识界的重要任务。于是，有见识、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对传统采取反思和批判的态度，从不同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和理论阐述，形成了多种理论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的繁荣局面。

实际上，正是各种新的理论思想的出现，才使文学研究拓展了自己的范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30多年来，新的解读经典作品的著作成倍增加，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增强了知识分子的自觉性和使命感。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持欢迎的、参与的态度，而不是倒退到过去，固守已经被证明过于狭隘的传统批评，更不应采取抵制和反对的态度。当然，传统的批评也有它自身存在的理由。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继续坚持。但不要采取压制别人，压制新型理论的态度。为什么不允许多样批评同时存在呢？你可以坚持你的做法，可以用你的成果去说服别人，但不要指责别人甚至限制别人的做法。198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曾发生过一场争论，是关于西方文化概念及课程设置的争论，这场争论最终以多

元文化的胜利而结束。所以，对待“西方文论”也应该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义的文化研究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许多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投身于文化研究，传统的文学研究日趋衰落或处于守势。有些文学教授甚至从弥尔顿转向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肥皂剧，整个放弃了传统的文学研究。

从广义的概念而言，文化研究就是理解文化的作用和功能，尤其是在现时世界中文化的作用和功能：在一个由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混合的世界上，在一个由国家权力、媒体工业和跨国公司组成的世界上，文化生产如何运作？个人和群体的文化身份如何构成？人们如何受到文化力量的影响和控制？在多大程度上受文化形式的支配？在多大程度上人们能够成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主体？又在多大程度上其选择会受到无法控制的力量限制？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文学研究。但因它大大促进了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所以也推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实际上，文化研究只是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实践来对待。

事实上，文化研究与当前的社会文化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的世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二律背反和悖论。人人难以容忍宏大叙事，然而人人似乎都在接受并兜售宏大叙事，而其中最宏大的就是资本的宏大叙事。看来世界需要一场真正的革命，而世界又从未像今天这样对革命感到厌倦和恐惧。人们声称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然而意识形态又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作为后现代时期的精神和基调的差异和区别，30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普遍赞扬，然而与此同时，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取消差异，通过文化、社会和经济的方式，把一致性和标准化强加给人们的意识、情感、想象、动机、欲望和趣味。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摆脱帝国主义，然而今天帝国主义却积聚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各种族裔的、种族的、文化的边缘群体在批判和消解西方霸权中正形成一种历史性的阵营，但是西方现在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一方面，非西方的批评家正在否定西方的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准则；另一方面，人人都在根据经济

发展论和工具理性来评价现代化的程度。这种反讽性的二律背反还可以列下去。但它们都表明了一点：对一种统治和压迫的揭露和抨击结果总是以忽视另一种统治和压迫而告终。激进的帝国主义的批评家常常被指责为文化的、美学的、社会的或知识的帝国主义。反基础论正在变成当代进步政治的口头语，而本质论仍然是每一个批评群体的有力的基本思想战略。差异政治常常只是身份政治的别名。正是这些难以处理的反讽和悖论的交织存在，导致了文化研究的产生和发展。

但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最近却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一些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强调回归细读传统，反对文化研究。他们认为，应该强化经典意识，以英国文学中的伟大传统或利维斯的细读理论认真阅读经典文本，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从而提高人们的人文素质。而文化研究不仅重新界定经典篇目，而且把注意力转向通俗作品，转向电影、电视、计算机、音乐、绘画、体育、乃至同性恋等社会现象，将文学研究和教学引入了歧途，因此应该加以抵制。乍看起来，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也确实值得深思。然而，如果认真思考，这其中却包含着许多问题，例如文学研究的传统和构成，理论的认识和作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等等，但最重要的恐怕是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

以文化干预社会现实是当前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使命。我们知道，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观察社会、认识社会、找出社会的缺陷进行分析批判，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换句话说，就是做社会“医生”，检查社会是否健康，然后开出药方，进行治疗，使社会健康发展。实际上，古今中外，知识分子中的有志之士都是这么做的。为了对社会进行认识分析，无疑也需要依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因此知识分子也常常对过去进行反思，阅读过去的各种文本，包括以各种文字形式和非文字形式记载的社会文本。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出发点是关注社会现实，以文化形式影响现实。就此而言，一些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例如海湾战争之后，哥伦比亚大学的布鲁斯·罗宾斯从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角度对之进行批判和认识，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朱迪丝·巴特勒从话语和权力方面对之进行了分析；“9·11”事件刚一发生，爱德华·萨义德就发表文章，从当前社会和文化传统方面分析其发生的内在原因，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则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从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所引起的社会

矛盾方面进行剖析；前两年以色列攻击巴勒斯坦的事件发生不久，三好将夫等一批知识分子便率先发起声援巴勒斯坦、制止杀害平民和反对恐怖主义的签名活动，要求人文学者打破沉默。所有这些学者都是文学系的教授，为什么他们能如此关注社会现实，而不是埋头于阅读经典文本，从中获取审美的享受？归根到底，是他们心里牢记着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

正是出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大批学者才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学科研究发起了冲击。因为，在信息社会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迅速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仍要求人们封闭在象牙塔里固守传统的经典，只通过细读获取审美享受的作法显然是不妥当的，难以适应当代的社会发展。在全球化时期，跨国公司兴起，贫富差距拉大，资本主义消费观念到处扩张，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国家权力日趋衰微，人们怎么能将自己束之高阁，对社会的种种现象无动于衷呢？面对后殖民政治的扩张、民族主义的高涨、新权力结构的形成，知识分子又怎么能不考虑实际问题呢？因此，这些问题如何由文化形式表现出来，文化又以何种形式进行干预，便构成今日文化研究的焦点。

应该说明的是，强调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是否定传统的文学研究。传统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和重要价值。其实，文化研究不仅在方法上借鉴了文学研究，而且把大量经典文学作品作为它的文化资源，并对文本进行细致的研读和分析。因此，不应该把两者对立起来，而应该使它们互相促进。

总之，当代西方文论基本上是一种批判的理论，是我们认识社会和理解文化（包括文学）的工具。由于它涉及多种学科，或者说是跨学科的理论，所以学习当代西方文论重在提高综合理论素质，提高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平，并把它应用于社会文化和文学实践。当代西方文论并不是万能的理论，其中每种理论都有它的深刻性和合理性，但也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读者在学习过程中应该注意汲取精华，避免生搬硬套，最好在综合理解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看法。